

理性之于政治

——从《理想国》的政体设计看理性节制对民主政治的意义

袁金丰 赵凤琴

[摘要] 民主和民主政治已日渐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对其本身运作及实践模式的认识不同,民主在西方国家的命运与今日在后现代国家的命运有着极大的差异,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民主的天然“护卫者”——理性、节制——的重视程度不同引起的。而柏拉图已经将民主制度作为“次恶”的政治制度来考量,已向人们昭示:民主的真正实现必须有理性及克制的保证。而民主与共和的价值统一正是民主与理性相谋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 民主; 理性; 节制; 民主政治; 共和

[中图分类号] D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2009)06-056-2

在所谓的西方现代国家里,民主和民主政治成为一种时尚和普遍的价值追求,那已是二三百年的事了,经历了二百年的演绎实践,民主的价值和恩泽似有偏向地滋润着“超前”的西方人。然而,一种萌动的民主的价值诉求及渴望在经历了一百年前的国人的冲动及20世纪的失败之后,今日又逐渐在人们的心中萌芽,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质上讲,民主的原始动议就是人对自己的确认及对自己的命运及现状的主导权,即自己为自己做主。人类社会的前期,由于条件的限制,人人都对自己做主的局面是一种浪费,那时,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及生存的压力,使人天然地自觉认同于“非我”的权威及主宰,这样,民主便只有作为人的天性的诉求与渴望潜藏于人的心中,有时甚至是潜意识的,当人类的成熟及成长足以使人们可以不靠那种“无奈”的服从就能发展时,民主的诉求就开始迸发、实现并扩散。这样,我们就不能怀疑民主的发展是人类的进步,人越能为自己做主,便越能体现自己,也就是越民主。这是人类发展的方向,这个价值目标是不可逆的,单向的。

马上产生的问题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决定自己?都能实现这些目标?是不是自己的决定不会妨碍自己对自己的做主?这是民主开始就会立即产生的问题,所以,民主的运作后于人类的产生。当价值确定之后,

随后的工具性技术性的服务于民主价值企求的原则就必须产生,必须服务于民主价值。有的成了服务于民主价值的东西,而有的和民主一起成了价值追求(如共和),其中,理性或节制就成了滋养民主的土壤及家园。而对这个说法或观念,我们又必须从古今的民主践行中找到根据。

与东方文明不同,古希腊的繁荣与海洋及商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一个固定状态下的农耕文化的特点自然迥异于一个变动的的不确定的生存状态。在古希腊,由于地域及生存的压力,商业及海运发达,使早期的人们就开始奔于变动及交换,而“计算”与个体的相对自由便由于对其土地的依附的减少,较早地植根于其心中。固然,那时人们忙于战争与祭祀,但人们从没有忘记自己个体的狂欢与张扬。虽然柏拉图极力反对这种非节制非理性的欲望,然而,若没有这些,柏拉图的理性与节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柏拉图的设计是对早期民主实践产生的弊病的医治及对无秩序的规范。在先期的调和中,民主在西方文化的机体中较早地产生了自己可以生长成熟的土壤,为后西西方人对民主的科学设计及践行从某种角度讲奠定了理论和文化上的渊源性的基础。

我们不难发现,对民主的价值诉求产生于在人们的参与实践中逐步被人们接受。只有有了这样的追求,

[作者简介] 袁金丰,西南民族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中国哲学研究生;

赵凤琴,西南民族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中国哲学研究生。 四川成都 610064

民主才有可能。而当民主本身的扩张碍于民主时，必须要有其保守者及调和者，去保证其能为其主体——人——的自我实现而服务。在古希腊，设计理想国的柏拉图试图完成这些，虽然不曾完成。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政治制度（或政体）可以分为五种：王政（哲学家为王）、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及僭主政制。若以今人之观点，许多人必认同民主政制为最佳的政治选择。而在理想国的设计中，民主政制是其次差的政制，最好的政制是“王政”，是由一个理想的设计中的哲学家来护卫国家。而其它四种均为不善的差的政制，恶的程度依次加强，王政为极恶的。而在柏拉图四种恶的政体的演化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哲学家地位的不断被认可及政治的衰落，城邦人的性格渐次恶化，善的成分慢慢减少，而国家的政治制度一步步恶化。其中的民主政制不是想像中个人对自己的主宰及决定，而是造成了每个个人对自己欲望的不节制的非理性的诉求，以致狂热疯狂，疯狂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理性的混乱及盲从。当一种诉求超越了极限，达到伤害自身的时候，柏拉图把它定格于非善及恶的前奏。其实，狂热的人们很快便借来了自己以外的主宰来决定自己，完全背离了人们的初衷，这样，民主政制就必然性地滑入了极恶的深渊——僭主政制。然而到了僭主政体，似乎又该回到王政。柏拉图没有设计人们何以能走出极恶政体的桎梏，走向光明的善，但却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极端民主下的可怕和对民主自身的背离的画面，向人们警示民主将丧失的尴尬。

有人说，柏拉图不认同民主政制是因为其生存的“国家”及时代的现状，战争的冲击使民主政制变得脆弱，而民主城邦内的争执又成了削弱战争能力的内耗。柏拉图受尽了混乱及战败和民主政制的苦（包括苏格拉底的死），秩序和稳定的现实追求也支持了柏拉图对民主政制的不认同。所以，柏拉图把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威赋予符合其善的理念的最优秀的哲学家。然而，到了后期，柏拉图又发现，仅靠一种“道德”及善的某一层面的设计亦无法使其理想国实现，柏拉图又不得不寻求“法律”规则帮助。这样的看法，也可以是其不认同民主政制的原因，也是现实的要求。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民主政制在当时的败坏，政权与民众

的恶化，恰恰就是民主本身的极端化的劣根性的后果或副产品。柏拉图在善中的节制的设计上，就不自觉地把节制赋予民主，认为唯有节制的民主才有可能有效，唯有理性的人用节制的思维及品性去护卫国家才是安全的。

而同样的问题马上产生，在理想国中，整体的思维品格中无不透着“中道”、理性、节制、勇敢、自由，不论国家及个人的生活，不论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都要坚守“中道”。然则，同样主张中庸及中道的中华文明，在对待问题时，迥异地很少彰显中道与节制，时时充满极端与非理性。在民主的践行方面，亦是如此。虽然中国没有真正的人的个体解放，缺少自由精神的基础，然而，当代人们试着去接受民主时，虽然有国人急于求成的冲动及挽救民族的急迫感，但对那极端的理性的程度仍让人感到吃惊，几乎断送了整个民族的价值基础。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与共和的关系问题。虽然人们习惯把两者连用，其实意义相差很大。民主主张个性的张扬，充分表达，力求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行动诉求。而共和恰恰是为了各方面都能最大限度实现自己而不致于伤害对方而达成的某种妥协，从而能共同运作的“共”与“和”的共同的平衡机制的共和局面。从某种角度讲，民主和共和的价值取向不同，而又互相融合在一起，从而使终极目标一致——保卫民主价值的成果。其实，共和的作用便是理性与克制节制的作用，只是人们更多地把共和与民主一起作为价值追求。这样，理性与克制不仅作为原则保卫民主的实现，而且以共和的形式成了与民主一起的价值追求。这样，民主与共和便成了一个更为理想的政治追求。

因此，“理想国”中柏拉图的政治制度的区分及设计使民主政制处于次恶的位置的理念是有其深刻依据的，与其说是柏拉图反对民主政制，倒不如说是民主政制在当时已经向世人昭示：真正的民主的发展离不开保卫她的理性与节制。柏拉图的政制的理想设计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护邦城和城邦中人的利益，而这与民主共和政制体制的目标又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理性与节制作为理念价值及民主原则的双重意义便自然是今日民主共和政治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 柏拉图. 理想国 [M]. 商务印书馆, 1986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罗素. 西方哲学史 [M]. 商务印书馆, 1976
阎小波. 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美〕萨拜因, 等. 政治学说史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